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建设及经验启示

吴敏超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绝大多数位于敌后，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加上相对贫瘠的自然条件，建设和发展非常不易。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抗日武装需要持续的物资供应以支撑长期战争；另一方面，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又饱受战火摧残，民生凋敝，迫切需要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因此，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建设便肩负起双重使命，既要为大规模抗日军队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又要全力纾解群众的生活困境。唯有实现抗战需求与民生改善的统筹兼顾，才能凝聚起全民抗战的向心力，为最终赢得胜利筑牢根基。

坚持一边打仗一边生产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最大的任务是抵抗日本侵略，夺取抗战胜利。军队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没有军队就不能抗战，没有军队就不能开辟和保卫根据地。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决定了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随着战争的旷日经久，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难以支撑长期斗争。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了供应不足、物价飞涨等现象，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事实上，这项运动的发起经过长期酝酿和准备，有一个逐渐深入、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也是其能够在1941年后大规模持续开展的原因之一。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不久，由于经费不足，有的留守部队从事种菜、养猪、做鞋等生产，改善战士生活。但这些生产运动规模较小，没有广泛推行。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国共合作面临挑战。此时正值《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毛泽东同志在发刊词中以敏锐眼光重点谈到“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认为这么做既能改善军队生活，又能振奋军队精神，增强战斗力。当时这一认识还未成为普遍认识，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其前瞻性。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李富春同志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号召组织群众搞好生产。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高度。中央对比较巩固的地区和不巩固地区的部队，甚至对“行止无定”的部队均提出相应要求。可见，一项政策的最终落地经历较为长期的酝酿，最终走向成熟。这也是延安精神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

1941年春，八路军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垦

荒地，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1941年和1942年两年，陕甘宁边区军队和机关学校通过自己动手，解决了大部分日用所需。毛泽东同志予以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军队“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在日本的残酷侵略和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自立更生，在陕甘宁这样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的地区，实现了自给自足、丰衣足食。这既是从未有过的奇迹，也是极为了不起的成就。

陕甘宁边区基本处于后方，军事压力相对较小，军队具备开展生产的客观条件。那么，前方部队在战争环境下，能一边打仗、一边生产吗？答案是能。大生产运动逐步发展为全国各根据地的普遍运动。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大多数部队做到粮食自给一个半月到三个月，蔬菜基本自给。山东、华中根据地部队通过自己动手，也保障了基本供给，甚至还有了进一步贮备。1945年初，毛泽东同志发表《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肯定晋察冀根据地实现劳力和武力结合、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被同等看重，指出：当春耕开始时，派专门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有的部队规定农忙时期以50%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拥护，从此更高一步。

军队在一边打仗的同时，一边从事生产，不仅有效解决了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更是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全局，将经济问题置于与军事、政治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从抗战全局出发发动军队从事生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更是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

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深知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积极作用，真正将人民“组织起来”，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和手工业。

一是开垦荒地。陕甘宁边区自1939年后每年增开荒地，1943年发展为普遍的运动，原计划开荒39万亩，实际开荒高达97万

亩，发挥出群众巨大的劳动干劲。基层干部将开荒作为主要工作，以身作则冲在最前线，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各地还评选与奖励开荒劳动英雄，鼓舞广大群众的开荒热情。开荒运动使耕地面积大幅扩张，农业产量跨越式增长，为边区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兴修水利。水利工程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单靠一村一户的力量难以完成，组织工作难度极大。皖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为防止水患，保障农业生产，决定修建大坝。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吕惠生组织21万民工，在长江边修建了黄丝滩新堤，屏障无为、巢县、含山等县300多万亩农田，保护10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皖中人民感谢吕惠生等干部的功绩，将新堤命名为“惠生堤”。

三是组织合作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组织群众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合作社。中国农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分散且规模小，生产效率低。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体私有经济之上的互助组织。合作社把群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推动生产、消费、运输，提高了效率。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在生产过程中，总会遇到种种困难。如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一场暴雨过后，辛苦开垦的农田和庄稼毁于一旦。但有时候，困难反而能激发劳动热情，迸发出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和“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优秀文艺作品最能展现时代风貌与精神。鲁艺师生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反映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和崭新的农民形象。还有许多作品记录了“又战斗又生产”的壮举，也揭示了“生产是为打胜仗”的道理，成为革命文艺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要求党政工作人员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这就是不只向人民要东西、更要给人民东西的生动写照。毛泽东同志的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群众经验”，真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即要把生产开展成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努力倾听群众的声音、善于总结群众的生产经验。在大生产运动中，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更有能力和动力支持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和抗日斗争，形成了军民抗战到底的局面。

军民团结一心凝聚力量

抗日战争是集政治、经济、军事为一体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群众彻底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政权与广大人民血脉相连、互相支撑。不管是军队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还是党政机关领导人民开展生产运动，事实上都增强了党政军

民之间的纽带与感情。1943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群众方面，重新宣布拥军公约。这有利于加强军民大团结、密切党政军民关系。

在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不断动员和组织群众，基层政治获得进步，流氓被改造，风俗在改变，农村面貌为之一新。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衷心拥护和支持，努力从事生产，踊跃上交公粮、送子女参军，形成“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军民鱼水深情。强大的群众支持成为根据地坚持抗战的重要动力。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利用战争发国难财，贪污成风。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打仗与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国民党拥有粮食产量丰富的广大地区，但大部分粮食被经手人员中饱，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在敌后地区以及陕北这样的贫瘠区域，却能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问题。这些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赢得了民心。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参观延安后，由衷地发出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抗日，而且在建党、建政、建军方面一体推进，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大生产运动的号角声中，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明确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了中国的解放与发展。党培养出一批政治可靠、党性好的负责干部，参加贸易、金融、财政事业，积累丰富经验，成长为专门人才。这为之后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转向生产建设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不仅考验了党带领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能力，还考验了根据地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群众工作的能力。历史证明，只有彻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让军队一边战斗、一边生产，使抗战的军事力量不断获得发展；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才能巩固根据地，为持久抗战提供稳固依托；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作风，才能真正彻底地将群众动员与组织起来，将民族独立解放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的宝贵财富，更为当代中国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中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和启示——唯有以创新为动力、以民生为根基、以团结为纽带，独立自主，奋发有为，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实现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的统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主任）

经济信息化、智能化大潮正在风起云涌，数据已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资源，而是和土地、资本一样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据相关预测，数据流量每增加10%，将带动GDP增长0.2%。数据流动对各行业利润增长的平均促进率为10%左右。2024年中国数据生产总量达41.06泽字节(ZB)，数字贸易规模稳居世界前列。随着数据资源规模持续扩大，数据要素价值化、市场化进程提速，加快数据市场建设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的重要路径。那么，什么是数据市场？如何建立我国数据市场？数据市场又如何实现更规范、更完善？

在很多人看来，数据市场是一种新型市场，具有很强的创新性特征。实际上，数据市场首先是市场，具有一般市场的属性和特点。它是指以数据产品或服务为交易对象，以数据供需双方为核心交易主体，将数据要素转化为数据产品，通过数据流通实现参与各方价值与诉求的市场。数据市场的构成与传统要素市场相类似，由交易对象和供求双方组成。

具体来看，数据市场的交易对象包括原始数据和经过清洗、整合、标注后的加工数据以及封装后的标准化数据服务产品。数据的供给方为多元主体，既包括自身业务产生数据的企业，也包括通过业务流程收集政务数据、统计信息、科研数据等的政府机构和公共机构，还包括专业收集、整合、转售数据的数据经纪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催生了广泛的需求场景。比如，企业将数据用于精准营销、风险管理、产品优化；政府部门运用数据服务于城市治理、政策制定、市场监管；开发者运用第三方数据搭建软件架构；等等。因此，数据的需求方十分庞大。

当然，数据市场与传统市场还是有差异的，这主要体现在数据的定价机制与交易机制上。数据价值具有非常强的场景依赖。数据的定价形式众多，包含按次调用、订阅制、分层定价、收益分成等，不同定价模式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同时，相较于传统要素市场，数据市场的交易模式也有较大创新，既包含平台交易和场外交易，也存在数据联盟内部的共享数据池，如银行行业间共享的反诈骗数据。此外，由于数据要素的可复制性，数据的交易越来越多采取隐私增强技术支持交易，即通过可信执行环境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以进一步保障数据所有方的权益。

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数据市场的建立和运行需要制度保障。建设数据市场，需要完善的数据规则制度、标准。数据要素具有非物质性、可复制性、主体多元化的特点，数据要素的交易必须以规范制度为前提。目前，数据的分类没有统一规格，缺乏全国通行的数据“语言”体系，数据存在对接难、应用难、融合难的困局。构建统一数据市场的第一步，就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统筹下，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规范，制定包含数据分类、格式、权限、标注、安全等级的规范体系，并对接国际标准，增强全球兼容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这为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数据市场建设需要培育经营主体。数据经营主体是推动数据市场发展的核心力量，其中，数商是指以数据作为业务活动的主要对象或主要生产原料的经济主体。作为数据要素的服务提供者，数商在数据产生、数据管理、数据流通与数据交易等方面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培育数商有助于推动数据要素高效流通、价值挖掘和价值实现。数商主要包括服务型数商、应用型数商和技术型数商等，分别为数据流通、数据利用、数据集采等提供服务。一方面，应积极引导相关机构开放高价值公共数据，如交通、气象数据等，通过授权运营释放价值。另一方面，激励企业数据资产化，鼓励企业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将数据资源纳入资产管理体系统，明晰其价值，引导其开发行业数据产品或开展数据合作。

数据市场建设需要数据基础设施支撑。同有形生产要素的交易需要借助公路网、铁路网一样，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需要通过网络设施、算力设施、安全设施等数据流通利用设施才能实现。没有数据基础设施提供支撑，数据就如同存放在一座座“孤岛”上，失去被应用、被市场化的可能。建设流通利用设施底座，实现数据在全国不同区域、组织、行业之间安全有序流动，最终形成“国家级+区域性+行业性”互联互通的多层次数据市场体系，推动数据交易规范化和高效化，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

数据市场建设亟需深化国际合作。数据要素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开拓国际数据市场、融入全球数据贸易是中国提升数字竞争力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既要 将数据跨境流通纳入数字经济发展相关规划，明确吸引国际数据资源流入和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发展目标，还要与全球数字经济标准、规则的建构主体开展合规对话，探索数据研发和评估的标准互认，推动国际隐私保护技术、数据水印技术等通过国际认证，参与全球数据规则制定。在推进国际合作中，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差异化流动框架，采用区块链技术和隐私计算技术，在保障数据所有者的隐私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推动数据跨境交易流动，用分级分类标准替代“一刀切”管制。积极搭建合作框架，加强数据保护立法，协调数据安全标准，在保障数据主权的同时共享全球数据红利，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青年学人

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

王孝松

营商环境是企业等经营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在现代经济中，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于企业经营绩效和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开放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这不仅深化了对营商环境内涵的认识，也拓展了营商环境的外延，为我国建设一流营商环境指明了方向，展现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营商环境包括影响企业活动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一个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招商引资的水平，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企业以及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社会就业等。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改善营商环境也是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必要前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了新的部署，提出了一系列重点举措和战略安排。概括而言，一流的营商环境，要兼具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特征。其中，打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一般来讲，是强调加快国内制度规则与国际接轨，通过优化管理体制、扩大市场准入、完善服务保障，实现营商环境更为开放包容。而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因时顺势，持续营造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加快塑造国际竞争合作新优

势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开放与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是内在统一、相互成就的。

其一，开放与国际化营商环境具有高度统一的内涵。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关键要素，开放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对我国来说，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不仅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而且有助于吸收先进技术、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为企业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机遇，促进经济繁荣，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就是重要的营商环境。

其二，国际化营商环境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类不确定性增加。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越要维护全球化发展，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具体而言，就是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以国际化营商环境的确定性应对外部各种不确定性，从而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

其三，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打造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在4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国经历了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致力于削减贸易壁垒、放宽市场准入，为“引进来”和“走出去”提供政策支撑和保障。可以说，这是通过政策变革来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创新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方式举措，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更为凸显。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制度型开放”。这是聚焦规则与制度层面的改变，要求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市场规则，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相关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由此可见，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主要内容，以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目标，一定意义上是连接国内外经贸规则的桥梁，可以为优化营商环境扫清制度障碍，有助于打造一流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开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外开放没有止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也非一日之功。未来，要站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高度，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准入畅通、规则一致、设施联通和监管协同，又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同时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持续打造开放范围更广、开放领域更多、开放水平更高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一是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要始终以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为出发点，拓宽人才、技术和资金等双向开放通道，通过构建立体化的开放政策体系，引领全球资源要素流向并逐步重构配置版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更加优质的服务、更有价值的创新、更高质量的人才等，打造有利于创新要素集聚、发展动能提升的良好环境。

二是扩展开放领域。进一步有序扩大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领域的开放。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开展经贸规则创新试验，营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化营商环境。

三是提升开放质量。相关部门要积极主动作为，提升政策供给的精准性、有效性，培育外贸新动能。优化完善“口岸+目的地”联合监管、“白名单+风险监测”、第三方采信等模式，深化加工贸易改革，支持高新技术产业、链主企业发展，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同时，还要推动放宽外资准入、加大服务外商投资力度等，用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诚信守约的人文环境、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投资，以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不断提升发展活力。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水平对外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改革越深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 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10月2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本版编辑 欧阳优 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